

全球化持续深入 中国经济应转向消费驱动

□本报记者 陈莹莹 赵白执南



制图/王力

编者按

今年以来，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，挑战与机遇并存。近日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九位专家，就经济全球化趋势、中美两国经济增长潜力、中美两国金融科技差异化发展路径等热点话题，在北京接受了中国证券报记者的专访。

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周期性爆发

中国证券报:如何看待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?有人担忧金融危机可能会周期性爆发,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?

亚当·珀森:我不认为金融危机会周期性爆发。一个国家能否保持经济正常运行,本国经济的健康状况或抗压能力才是决定因素。虽然每一次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,一些新兴经济体就会受到冲击,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市场会爆发全面危机。

尼古拉斯·维昂:未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发展重心会有所不同。英国会受到退欧的影响,但欧洲总体发展健康。对于欧洲领导人来说,让金融体系在面对下一次经济危机时有足够“回弹力”是他们需要优先考虑的。中国的决策者对宏观经济政策和供给侧改革都有很好的把握,但在(资金)价格等方面仍有提高空间,在公司治理等方面也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。

中国证券报:贸易不平衡是否必然存在?新兴市场应当如何促进贸易发展?如何看待WTO等多边组织在当下全球经济和贸易中发挥的作用?

查德·伯恩:双边贸易不平衡是很正常的,世界贸易真正重要的是要达到总体上的平衡。促进贸易发展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:一方面是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,另一方面是保护产权、良好治理等。此外,要建立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,鼓励竞争,降低贸易壁垒,以及建立更富弹性的就业市场。过去20年,国际组织的角色是助力解决争端。世贸组织在解决国家间小的贸易争端方面很有效,但现在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国家开始不再依靠世贸组织了。

玛丽·罗夫利:现在全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,与之相关的电脑、手机等产品贸易量也迅速攀升,随之而来的就是跨境数据传输、数据存储隐私权等问题,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多边

机制来解决,但需要新的、更有针对性的条款。比如,判定网上购物个人信息的归属权,我们需结合隐私权、信息保护的权利等不同的体系。

中国证券报:如何看待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对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方面的贡献?对于发挥“一带一路”在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,有何建议?

尼古拉斯·维昂: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很有建设性,尤其是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针对西欧与中国之间那些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入的地区。未来更好发挥其作用仍需关注两方面:一是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是通过借款达成的,对于某些借贷过度的国家,中国相关机构应当注意其信用和偿还能力。二是“一带一路”旨在改善世界、改善各国关注的共同问题,那么对作为承包商的非中国企业,也应当像对待中国企业一样公平开放。

玛丽·罗夫利:造成区域发展不均衡的一个重要原因,可能是有些地区更靠近国际市场。偏远地区的收入增长与沿海区域存在差距,说明了连接农村地区的重要性。中国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,于是大力修建机场、公路、桥梁等基础设施。联通中亚、非洲与全球市场是帮助“一带一路”地区摆脱贫困、增长收入的重要方面。

不过,需要注意的是,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还比较新,很多项目是面向未来的。未来需要关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涉及的基础设施项目、负债、社会状况改善等。此外,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发展需要许多国际合作。以中亚农贸市场为例,一方面要确保这些中亚国家生产出中国消费者接受的高质量产品,另一方面也要确保他们及时把握市场规律。与此同时,中国市场也要确保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保持开放。总而言之,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很多帮助。这些都是世界银行、亚洲开发银行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可以关注的。

美国经济能保持较好增长

中国证券报:数据显示,美国2018年一季度GDP增长为2.3%,而2017年第二、三季度GDP增长率一度超过3%。美国未来能否保持3%左右的GDP增长率?

尼古拉斯·拉迪:美国可以很好地维持2%或2.5%的增长率,短期内可能达到3%,但3%的增长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持续的,除非它在生产率方面有重大突破。

查德·伯恩:目前美国经济增长情况良好,有些方面还可以改善。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很低,但生产率增长速度、劳动力参与率等都没有达到预期。

约瑟夫·加农:相较于里根时期,目前的美国经济更好一些。当下美国失业率为3.9%,而里根时期的失业率则接近10%。未来形势也可能很快发生变化,也许会导致贸易逆差加速扩大,美元加速升值等。但目前来看,美国经济还没有出现问题,是否会向这样的趋势发展仍需要观察。

全球化步伐将持续迈进

中国证券报:未来全球化将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?

亚当·珀森:在短期的2-5年内,全球化会面临挑战。但长期来看,全球化的步伐仍将持续。中国在加大对外投资,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国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继续推进TPP,欧盟也在与墨西哥、加拿大等国加强往来。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以现在的方式行事,其他国家将会开始商讨建立一个新的不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体系。

中国证券报:美国经济增长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?

约瑟夫·加农: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。而与贸易赤字相比,财政赤字的问题更大。美国一直从和其他国家借贷,这样的情况可以持续一时,但长期来看肯定是不可持续的。最近美国政府通过了针对额外消费的减税法案,我认为这反而会增加借贷。贷款增加会拉升(市场)利率,从而增加美国债券的吸引力,使逆差进一步扩大。为了避免形成这样的循环,当前美国应扭转财政政策,应当加税而非减税。

目前美元走势略强,但涨幅不及上世纪80年代末,现在还处于美元升值的“初期阶段”。当然也有可能旧景重现,出现美元升值、贸易逆差恶化等,但现在断言还为时过早。我认为美元汇率上下略微浮动有助于保持贸易平衡,在努力追求贸易平衡的同时,美国可以对汇率进行适当管理。

查德·伯恩:对于中国和美国而言,这两大经济体能够从彼此的贸易中获得极大利好。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处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。中国是新兴经济体,可能快速增长,增速远超美国。美国是发达经济体,更加成熟,在提供不同种类的商品和服务上比中国更先进。过去一段时间里,中国经济已经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功,现在中国的发展变得更侧重消费,更侧重高质量,更侧重拥有更大比例的服务业。

中国经济转型成绩引人瞩目

中国证券报:如何评价中国后续的经济增长趋势?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是什么?

尼古拉斯·拉迪:中国的CPI水平一直控制在较优的范围内,低于2%;和几年前通货紧缩时期的数据相比,PP1一直控制在合理范围内;M2增长可能略低于预期,但也反映出中央银行和政府有计划地逐步减缓增长,与几年前相比也取得了一定成功。在贸易方面,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也是非常好的征兆。

雅各布·柯克加德:中国的经济转型非常引人瞩目。经济增速放缓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。目前来看,中国经济主要面临三大挑战:一是需要向环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变,这种转变会伴随一定的代价。比如,某些行业可能要被关停或转为对环境更有利的增长方式。

二是债务水平,中国不应该再回到依靠借钱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的“老路”。一方面这样的投资不再能提供丰厚的利润回报,另一方面这些债务最终会变成不良贷款。我认为,想要遏制不断攀升的债务水平,应继续推进国企改革。中国应当削减对业绩不佳的国有企业信贷支持。

三是财政体制。中国需要一个使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,才能避免强制性的土地出售、依赖外融资工具、影子银行以及其他权力滥用问题。中国幅员辽阔,各地在地理环境、经济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。建议中国政府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财权。这样地方政府才会“有多少需求造多少开支”,以满足在养老、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需求。

尼古拉斯·拉迪:从企业部门的角度讲,过去几年中,中国的金融风险急剧拉升,这主要是债务占GDP比率上升过快造成的。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,私企的杠杆率实际上已经在下降。中国政府经济部门的高层官员近日重提去杠杆,这对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来讲尤其必要。通常这些过度负债的公司利润率很低,甚至处于亏损状态,之所以借债就是为了使公司能够持续运转。

从居民部门的角度而言,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债券违约时而发生的阶段,这是过去不曾出现过的。当社会上出现债券违约后,有些公司可能会破产。但它也会迫使投资者、尤其是普通居民,意识到投资时应考虑风险,而不是仅仅考虑潜在回报,这是金融市场非常健康的发展方向。

尼古拉斯·维昂:信用风险在中国没有得到准确的定价。换言之,有一些债券应该更便宜,一些债券应该更贵。这需要建立更透明的市场,一方面为投资者提供借款人的财务信息和财务前景,另一方面也让投资者对自己的收益和潜在亏损有所预期。未来中国的金融系统必须更加成熟,对违约要有更多经验。

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转型

中国证券报: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,接下来应该侧重哪些改革?

雅各布·柯克加德:扩大消费对中国而言十分重要。如果储蓄和投资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过高,就会造成债务和泡沫。因此,中国经济必须向消费驱动转型,这就必然要求人们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。技能教育是中国走向消费型经济,从而让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。在中国持续城市化的进程中,来自农村的低技能人口很难在城市里获得好的工作机会,导致他们只能从事低薪工作,从而缺乏用以消费的资本。

约瑟夫·加农: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储蓄是件好事,但储蓄不能过多。这些钱需要花出去,花在汽车、服装、餐厅、食品、用餐、度假旅行等方面。为了鼓励消费,中国政府应该增加公共医疗支出,这样人们就不用担心生病后看医生、住院的费用;另外还可以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等。

尼古拉斯·拉迪: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有效投资和集约型增长。要在保持相当增长的同时逐步降低投资,可以通过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来实现。中国政府希望保持个人收入的高增长,在过去4-5年间,个人收入、可支配收入、税后收入和家庭收入都比GDP增速更快。此外,中国政府也有意改善环境和食品安全。下一步就是继续建立“社会安全网络”,将资源进一步向教育、退休、医疗保健领域倾斜,因为高质量不仅意味着高收入,也意味着提升生活质量。此外,保持一定增长最重要的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。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,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大幅下降,虽然2016年到2017期间略有回升,但资产回报率还不到2006年和2007年的一半。

查德·伯恩:我认为应当进行能让中国经济更加开放的改革,比如降低关税、消除贸易壁垒、开放服务业、引入更多外国竞争,还有金融领域开放等,绝对有助于缓解国际贸易的紧张局面,减少贸易壁垒、消除贸易摩擦。

亚当·珀森:中国需尽快推进房地产领域的税收改革。修改税法并不容易,但是就中国长期发展来看,中国需要保证金融领域的稳定,而房地产市场在金融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房地产吸引了太多资本,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标的。

中国证券报:2018年一季度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2.1%。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,请问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进一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?

玛丽·罗夫利:一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。中国创新能力日益增长,对于企业家而言,他们应当意识到创新是可以盈利的,而通过知识产权保护,可以避免在研发过程中出现的风险。二是为外国投资商和国内投资商建立平等的“游戏场”。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,中产阶层人数也迅速扩大,成为外商青睐的销售市场。中国过去为了给国外投资者提供同等机会而付出努力,但也要注意让国外投资者切实感受到他们是被公平对待的。换言之,提升各地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,与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一样重要。

从一定程度上说,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中也包含国外的研发和设计。外商投资企业、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出口份额持续增长,表明中国正在深度整合到全球生产当中。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仍主要来源于外资企业,说明即使在关键增长的市场,比如计算机设备、电子以及器械等市场中,包含“外来成分”而在中国组装、从中国再出口的产品仍然很多。